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陈婷,徐俊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研究[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47(6):97-105.

#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研究

陈婷 徐俊杰

(安庆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安徽 安庆 246133)

**摘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路径。作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最重要的减税政策,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是否能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尚缺乏充分探讨。论文选取沪深 A 股上市公司 2011~2022 年的数据,以 2018 年实施的增值税留抵退税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留抵退税政策能激励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对国有、高科技企业政策效果更为明显;进一步机制研究发现,留抵退税政策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研发创新产出为企业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助力。因此,需持续优化留抵退税政策,结合其他政策形成协同效应,并制定差异化退税策略,以高效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力。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财税政策;留抵退税;激励效应

**分类号:**F1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4)06-0097-09

## 一、引言

中国式现代化要求高质量发展,而依赖物质资源要素(资本、劳动力及原材料)的传统生产力很难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指导。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动态性、时代性及战略性的概念,是要素新优势、产业新形态、发展新路径、竞争新优势的集成表述<sup>[1]</sup>,代表着更创新、更高阶、更可持续的生产力发展方向。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sup>[2]</sup>。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

但要重视的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面临诸多挑战。新质生产力的鲜明特质是技术革命性突破<sup>[3]</sup>,是涵盖科技创新、产业体系创新等在内的综合性创新。创新活动具有高风险、持续时间长、产出结果不确定等特点,且创新过程中技术/知识具有一定的外部性<sup>[4]</sup>,仅依靠市场力量来推动企业的创新投入往往无法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所需的水平<sup>[5]</sup>。作为国家宏观调控重要手段,财税政策能够有效引导金融资源和社会资本更多地流向科技创新领域,纠正市场失灵,弥补外部效应<sup>[6]</sup>,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已有学者从理论层面论证财税政策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激励效应,如刘明慧等(2024)从塑造生产关系、调节产出分配效应、构建最优产业生态等方面论证了财税政策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

收稿日期:2024-06-29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科研计划项目“财税政策对安徽省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激励效应与优化研究”(2022AH051017)、“安徽省税收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现实基础及治理路径研究”(2024AH052772);安徽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村户双赢视角下帮扶产业的减贫机制研究”(AHSKQ2019D112);安徽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安徽打造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的优化机制研究”(AHSKY2022D128)

**第一作者简介:**陈婷(1988—),女,安徽安庆人,讲师,主要从事财务与会计理论、税收等研究。

**通信作者:**徐俊杰(1980—),男,安徽桐城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电子商务、数字经济等研究,E-mail:574594235@qq.com。

逻辑机理<sup>[7]</sup>。陶然(2024)提出税收政策能够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充分发挥资源配置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为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带来正效应<sup>[8]</sup>。国家亦出台一系列财税政策助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如财政资金支持(科技计划专项、政府采购等)、税收优惠(研发加计扣除、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等),等等。在此背景下,审视财税政策在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测度主要财税政策的政策效应以及研究如何通过优化财税政策工具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一系列财税政策中,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是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最重要的减税政策,惠及范围广且具有事前激励的特性,本文拟以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测度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激励效应。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一是从微观企业视角检验税收优惠政策的效应,特别是探究了留抵退税政策对不同要素禀赋差异下的微观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是否存在结构性影响,并从融资约束、交易成本和研发创新产出等渠道开展机制分析,丰富已有研究;二是通过探讨政策与市场合力对培育和发展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为完善税制、优化结构提供启示与借鉴。

二、政策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政策背景

增值税留抵退税,即将增值税期末未抵扣完的税额退还给纳税人。增值税实行链条抵扣机制,以纳税人当期销项税额抵扣进项税额后的余额为应纳税额。当进项税额大于销项税额时,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会形成留抵税额。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在不同时期经历了多次调整和优化。早期增值税留抵税额实行后期抵扣制度,归因于:一是该时期企业并不存在较大规模留抵税额;二是政府为预防分税制改革后经济发展过热。随着时间推移和经济发展,留抵税额所带来的企业资金被无偿占用问题逐渐凸显,为适应经济发展态势,政府开始逐步调整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从2018年《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2018年退还部分行业增值税留抵税额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简称70号公告),到2019年为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而发布的《关于明确部分先进制造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的公告》,再到2022年《关于进一步加大大增

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力度的公告》(4号公告)等,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惠及范围不断扩大,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留抵退税机制已经形成。根据财政部发布的2023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超过了2.2万亿元,其中办理留抵退税约6500亿元。留抵退税政策在改善企业财务状况、稳定产业链与供应链、提振市场活力、增强经济发展韧性等方面都具有显著的经济效应。本研究基于2018年开始大规模试点的留抵退税政策(即第70号公告)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1~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留抵退税政策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从宏观层面来看,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离不开国家财税政策支持。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轴心对传统生产力要素、技术和产业三大系统的全面重塑<sup>[9]</sup>,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强化新要素牵引力、掌握核心技术及实现产业系统升级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亟待跨越的难关,其中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sup>[10]</sup>。而科技创新活动具有产出不明确性、研发投入规模大、公共外溢性和回收周期长的特征,难以依靠私人投资形成稳定、持续的创新支撑,尤其是前瞻性、战略性、公益性的基础研究,更需要依靠财政提供长期持续的资金和政策支持,来承担创新过程中的试错、失败的风险,发挥价值驱动和战略牵引作用,启动、引导社会资本和其他资源积极投入科技创新活动中。故加强财税政策保障,是促进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新动能的关键支撑。

从微观层面来看,企业创新活动具有外部性。根据外部性理论,当发展新质生产力边际私人净收益小于边际社会净收益时,会抑制企业投入意愿,削弱企业科技创新动力<sup>[11]</sup>,外部性问题单靠市场力量无法解决,政府干预是解决外部性问题内部化的有效手段<sup>[12]</sup>。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将不能抵扣的进项税额退还给符合条件的企业,解决了不能抵扣的进项税对企业资金的占用,提高了企业现金流,带来显著的收入增加效应。释放的现金流可投入到研发、人才引进、技术改进等领域,激发企业研发热情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sup>[13~15]</sup>,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能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

从资金来源渠道来看,企业的融资方式包括外

源融资和内源融资。根据融资约束理论,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等外部因素制约,企业的融资行为受其财务状况的约束。这种约束限制了企业从外部获取资金的能力,使得企业更多地依赖内部融资来支持其投资活动<sup>[16]</sup>。当期无法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是对企业当期资金的无偿占用,影响企业现金流进而增加内源融资压力。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不仅直接增加了企业的现金流,还通过降低企业的税负,改善企业内源融资状况。此外,留抵退税也向市场释放出企业可获得额外经济利益及整体运营状况向好的积极信号<sup>[17]</sup>,这种信号有助于提升市场对企业未来发展的信心,降低企业在外源融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阻力和成本。在企业内源、外源融资压力得到释放的情况下,企业有更大的动力进行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和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有效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留抵退税政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需要有效的经济制度作为支撑和保障。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有效的经济制度应当是在最小化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sup>[18]</sup>。留抵不退的增值税进项税额是政府对企业生产要素的占用,形成了一种制度性交易成本<sup>[19]</sup>。制度性交易成本会抑制企业的创新活力,阻碍资源的有效配置。留抵退税政策作为税收制度的重要调整,直接减轻了企业的税负负担,缓解了其现金流压力。这种政策调整使得企业能够更快地回收资金,减少因资金占用而产生的财务成本,进而提升了资金的使用效率。此外,留抵退税还促进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引导资源流向更高效、更具发展潜力的领域,从而提高整体经济效率,间接降低交易成本<sup>[20]</sup>。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降低可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更加宽松的环境和有利的支持,促进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营商环境的优化改善,从而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留抵退税政策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

根据市场失灵理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并非总是有效的,特别是在创新领域。由于创新活动具有高风险、高投入和长周期的特点,市场机制往往难以充分激励创新。财税政策作为一种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可以介入市场,通过优化资源配置、降低创新

风险和提高创新收益等方式,有效激励创新活动。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使得企业有更多的资金用于研发投入,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具体来说,退税资金可以用于引进先进技术、购买研发设备、聘请高端人才等方面,从而提高企业的研发能力和创新水平。这些投入将直接转化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新质生产力。实证研究表明,实施留抵退税政策后,企业的研发投入明显增加,技术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郑家兴,2021<sup>[21]</sup>;郭月梅等,2023<sup>[22]</sup>)。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4:留抵退税政策通过提高企业研发创新产出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提升。

### 三、研究设计与变量说明

#### (一)数据来源

为了研究 2018 年发布的《70 号文件》中关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本研究选取我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 2011~2022 年间的样本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 WIND、CSMAR 数据库。为了保证本文数据结果的可靠性、准确性和稳定性,对数据进行了以下处理:剔除 ST、\*ST 和金融类企业;剔除净资产小于零的样本企业;剔除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企业。经过以上数据处理,最终得到 4549 个企业 34252 个样本。为了避免异常观测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的 1%和 99%百分位进行缩尾处理。

#### (二)变量设定

##### 1.被解释变量

新质生产力( $NPro$ )。参照宋佳等(2024)的做法<sup>[26]</sup>,采用以下三个步骤进行衡量:一是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作为计算新质生产力的样本。二是根据生产力二因素理论构建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劳动力细分为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两个子要素,生产工具分为硬科技和软科技两个子因素。活劳动指标由研发人员工资水平、研发团队在员工总数中的比例以及高学历人员在企业员工中的比例来衡量;物化劳动指标用固定资产占比和制造费用占比来衡量;硬科技指标由研发折旧摊销、研发租赁费和研发直接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来衡量;软科技指标通过总资产周转率、权益乘数衡量。三是利用熵值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形成企业新质生产力指标。

##### 2.核心解释变量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 $Treat \times Post$ )。在 2018 年的财税政策《70 号文件》中,制造业的 18 个特定



行业被选定作为增值税留抵退税的试点行业,这创造了一个税收优惠差异化的自然实验环境。本研究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设立两个核心解释变量 *Treat* 和 *Post*。变量 *Treat* 的定义是区分企业是否属于受政策惠及的行业,如果企业所在行业被包含在试点行业列表中,则 *Treat* 取值为 1,否则为 0;变量 *Post* 的定义是区分样本是否属于政策实施后的年份,如果样本所对应的年度在政策实施之后,则 *Post* 取值为 1,否则为 0。*Treat* 和 *Post* 的乘积(*Treat* × *Post*)可以用来衡量政策实施后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作用强度。

3.控制变量

为排除其他潜在因素对新质生产力成长的干扰,本研究引入数个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 *Size* (以企业年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衡量)、资产负债率 *Lev* (以年末总负债除以年末总资产来衡量)、总资产利润类 *ROA* (采用当年净利润与总资产平均余额的比值来衡量)、总资产周转率 *ATO* (采用营业收入与平均资产总额的比值来衡量)、现金流比率 *Cashflow* (以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营业收入来衡量)、公司成立年限 *FirmAge* (以当年年份-公司成立年份+1 取对数来衡量)、公司成长性 *Growth* (采用本年营业收入/上一年营业收入-1 来衡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Top1* (采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总股数来衡量)。

4.中介变量

根据本文的研究假设,分别选取融资约束 *FC*、交易成本 *COST* 和研发创新产出 *RIO* 作为中介变量。参照郭月梅等(2023)的做法<sup>[22]</sup>,本文采用 SA

指数作为融资约束的衡量指标;借鉴薛宇佳等(2023)的做法<sup>[23]</sup>,采用企业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值 *Cost* 作为交易成本的衡量指标。参照张健等(2018)关于创新机制的衡量<sup>[24]</sup>,采用企业研发企业发明专利数量 *patent* 衡量企业创新研发产出。

(三)模型设定与实证策略

本文的实证模型设定如下:

$$NPro_{it} = a_0 + a_1 Treat_i \times Post_i + \sum Control_{it} + \sum Firm + \sum Year + \epsilon_{it} \tag{1}$$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企业新质生产力(*NPro*);核心解释变量为留抵退税政策的政策冲击项(*Treat* × *Post*),*Control* 为控制变量组;此外,还控制了个体(*Firm*)、时间(*Year*)效应以及随机误差项( $\epsilon$ ),以控制非观测因素对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下标 *i* 和 *t* 分别代表个体企业和时间。

为了检验留抵退税政策激励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机制,在模型(1)的基础上,参照江艇(2022)的做法<sup>[25]</sup>,构建传导机制模型:

$$MV_{it} = \beta_0 + \beta_1 NPro_{it} + \sum Control_{it} + \sum Firm + \sum Year + \epsilon_{it} \tag{2}$$

其中,*MV* 是中介变量,回归时分别用 *COST*、*FC*、*RIO* 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代表企业交易成本、融资约束、研发创新产出。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如表 1 所示,我国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均值为 5.155,中位数为 4.752,标准差为 5.17,新质生

表 1 各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i>Npro</i>	34252	5.155	5.170	0.040	4.752	804.493
<i>treat</i>	34252	0.424	0.494	0.000	0.000	1.000
<i>post</i>	34252	0.532	0.499	0.000	1.000	1.000
<i>treat</i> × <i>post</i>	34252	0.179	0.384	0.000	0.000	1.000
<i>Size</i>	34252	22.245	1.295	19.570	22.056	26.452
<i>Lev</i>	34252	0.424	0.205	0.032	0.416	0.927
<i>ROA</i>	34252	0.039	0.067	-0.382	0.038	0.255
<i>ATO</i>	34252	0.639	0.435	0.055	0.543	2.891
<i>Cashflow</i>	34252	0.047	0.068	-0.199	0.046	0.266
<i>FIXED</i>	34252	0.208	0.157	0.002	0.176	0.725
<i>Growth</i>	34252	0.161	0.400	-0.653	0.102	3.894
<i>Top1</i>	34252	0.339	0.148	0.081	0.316	0.758
<i>FirmAge</i>	34252	2.926	0.333	1.386	2.996	3.611

产力发展水平呈正态分布,且最小值与最大值有明显差异,均值远小于最大值,表明不同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差异较大,且我国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整体水平较低,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另外,解释变量  $Treat \times Post$  的最小值与最大值也有明显差异,意味着样本的涵盖面较广,对研究结论的代表有促进作用。一系列控制变量的最小值与最大值也有显著差异,确保了本次研究的严谨性,同时增强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根据表 2 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的  $VIF$  值都小于 10,因而整体而言,本文所选取的指标不具有共线性,满足研究条件。

表 2 共线性检验		
	VIF	1/VIF
<i>Lev</i>	1.744	0.574
<i>ROA</i>	1.642	0.609
<i>Size</i>	1.527	0.655
<i>Cash flow</i>	1.333	0.75
<i>Top1</i>	1.115	0.897
$treat \times post$	1.113	0.899
<i>FirmAge</i>	1.112	0.9
<i>ATO</i>	1.111	0.9
<i>Growth</i>	1.110	0.901
<i>FIXED</i>	1.102	0.907
平均 VIF	1.291	—

(二)基准回归

为排除个体效应以及时间效应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最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此外为增强结果的可靠性,采用逐步回归的方式验证假设。表 3 为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回归(1)中核心解释变量  $treat \times post$  前面系数为 0.4617,且在 1%水平下显著。回归(2)中  $treat \times post$  前面系数为 0.4257,且在 1%水平下显著,表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有促进作用。控制变量中, $Size$  前面估计系数为 0.291,且在 1%水平下显著; $Lev$  前面估计系数为-0.3805,且在 1%水平下显著; $FirmAge$  前面系数为 0.9865,在 1%水平下显著。表明规模越大、资产负债率越低且存续年限越长的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越高,同时也说明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具有一定代表性。此外,方程的  $R^2$  也在 0.8 以上,模型拟合效果较好,解释力较强。综上,留抵退税政策充分发挥了其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驱动作用,有力促进了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从而支持了本文的核心结论。

表 3 基准回归		
变量	(1) <i>Npro</i>	(2) <i>Npro</i>
$treat \times post$	0.4617 *** (14.39)	0.4257 *** (14.86)
<i>Size</i>	—	0.2910 *** (11.62)
<i>Lev</i>	—	-0.3805 *** (-4.12)
<i>ROA</i>	—	-1.3066 *** (-7.73)
<i>ATO</i>	—	0.3328 *** (7.28)
<i>Cash flow</i>	—	0.1416 (1.04)
<i>FIXED</i>	—	8.3638 *** (59.87)
<i>Growth</i>	—	0.0267 (1.10)
<i>Top1</i>	—	-0.3228 ** (-2.06)
<i>FirmAge</i>	—	0.9865 *** (7.25)
常数项	5.0316 *** (556.63)	-5.9782 *** (-9.38)
企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33728	33728
$R^2$	0.798	0.842

注:括号内为稳健  $t$  统计量的值,\*\*\*, \*\*, \* 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下显著。下同。

(三)稳健性分析

1.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模型有效性需要满足的一个重要前提假设即平行趋势。为此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生成了留抵退税政策发生前后各 4 期的实验组与时间的虚拟变量,并以  $pre1$  作为基准期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代表留抵退税政策发生前的虚拟变量  $pre$  均不显著,表明政策发生前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因变量变化满足平行趋势,且代表留抵退税政策发生后的虚拟变量  $post1-4$  均至少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与因变量呈正相关关系,表明留抵退税政策效应显著且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如图 1 和表 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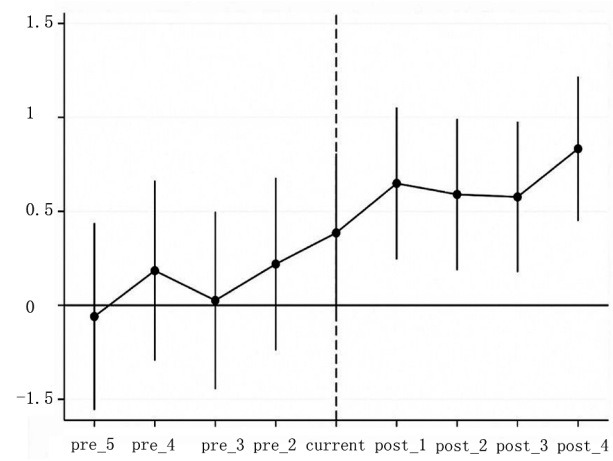


图 1 稳健性检验(平行趋势检验)

表 4 稳健性检验(平行趋势检验)

变量	<i>Npro</i>
<i>pre</i> _5	−0.0595(−0.20)
<i>pre</i> _4	0.1844(0.63)
<i>pre</i> _3	0.0261(0.09)
<i>pre</i> _2	0.2194(0.79)
<i>current</i>	0.3856(1.51)
<i>post</i> _1	0.6487*** (2.64)
<i>post</i> _2	0.5898** (2.41)
<i>post</i> _3	0.5766** (2.37)
<i>post</i> _4	0.8330*** (3.57)
常数项	3.0949*** (19.26)
企业效应	已控制
时间效应	已控制
观测值	34252
<i>R</i> <sup>2</sup>	0.008

2.剔除特殊样本检验

(1)考虑到本文所选样本时间区间包含了 2020 及之后的年份,2020 发生了影响全球的新冠疫情,此突发卫生公共事件对公司经营来说为严格外生的

外部冲击,如果不考虑此因素则可能导致遗漏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故本文剔除 2020 年及之后的特殊样本,再次进行回归,若在此情况下核心解释量显著性与前文结论保持一致,表明结果较为稳健。从表 5 第(1)、(2)列回归结果可知,核心解释变量 *treat* × *post* 的回归系数为 0.4706、0.4129,均为正数,且在 1%水平上显著,结果稳健。(2)为保证结果的普遍适用性,降低特殊样本的影响,本文将样本中房地产行业进行剔除,若结果依然成立,表明结论在普通样本中同样适用。从表 5 第(3)、(4)列回归结果可知,核心解释变量 *treat* × *post* 的回归系数为 0.4744、0.4120,依然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与新质生产力存在正相关关系,结果稳健。(3)为避免由于双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以及探究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可能存在的时滞性,本文对所有解释变量进行了 1 阶及 2 阶滞后处理,再次回归后结果如表 5 第(5)、(6)列所示,核心解释变量留抵退税政策的回归系数为 0.276、0.1401,依然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与因变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结果稳健。

表 5 稳健性检验(剔除异常数据、内生性检验)

变量	(1) 剔除 <i>covid</i> 影响 <i>Npro</i>	(2) 剔除 <i>covid</i> 影响 <i>Npro</i>	(3) 剔除房地产行业 <i>Npro</i>	(4) 剔除房地产行业 <i>Npro</i>	(5) 1 阶滞后 <i>F.Npro</i>	(6) 2 阶滞后 <i>F2.Npro</i>
<i>treat</i> × <i>post</i>	0.4706*** (11.14)	0.4129*** (10.98)	0.4744*** (14.60)	0.4120*** (14.26)	0.2760*** (8.84)	0.1401*** (4.12)
<i>Size</i>	—	0.3541*** (10.39)	—	0.2953*** (11.73)	0.3520*** (12.10)	0.3350*** (9.98)
<i>Lev</i>	—	−0.1410 (−1.11)	—	−0.3082*** (−3.31)	−0.2069* (−1.92)	0.0450 (0.37)
<i>ROA</i>	—	−0.9701*** (−4.34)	—	−1.3208*** (−7.75)	−1.2332*** (−6.12)	−0.6766*** (−3.30)
<i>ATO</i>	—	0.3078*** (4.91)	—	0.3416*** (7.39)	0.0658 (1.21)	−0.0704 (−1.15)
<i>Cash flow</i>	—	0.0730 (0.43)	—	0.2740* (1.96)	0.2314 (1.48)	0.5878*** (3.36)
<i>FIXED</i>	—	8.5417*** (49.67)	—	8.2607*** (58.53)	4.7137*** (27.80)	1.6657*** (9.41)
<i>Growth</i>	—	0.0370 (1.24)	—	0.0063 (0.25)	−0.0097 (−0.38)	−0.0495* (−1.89)
<i>Top1</i>	—	−0.5298*** (−2.62)	—	−0.2935* (−1.81)	−0.3201* (−1.82)	−0.2259 (−1.18)
<i>FirmAge</i>	—	1.5690*** (8.92)	—	0.9450*** (6.91)	0.7743*** (5.23)	0.6059*** (3.55)
常数项	4.7821*** (490.16)	−9.3299*** (−10.94)	5.1331*** (553.34)	−5.9184*** (−9.18)	−5.7514*** (−7.87)	−4.2242*** (−5.04)
企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22397	22397	32479	32479	28884	25120
<i>R</i> <sup>2</sup>	0.770	0.822	0.799	0.844	0.822	0.820

3.安慰剂检验

为降低其他潜在变量对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关系的影响,本文采用了反事实假定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即将实验组与对照组随机打乱,然后抽取相同数量的组作为新的“实验组”,政策时点作同样处理,由虚假的实验组与时间虚拟变量进行交互组成新的  $treat \times post$  变量,重复以上实验 500 次后绘成系数核密度图,结果表明系数大体服从正态分布,表明样本选择是随机的,不存在人为干扰的内生性问题,且真实回归系数落在小概率拒绝域,表明安慰检验通过。检验结果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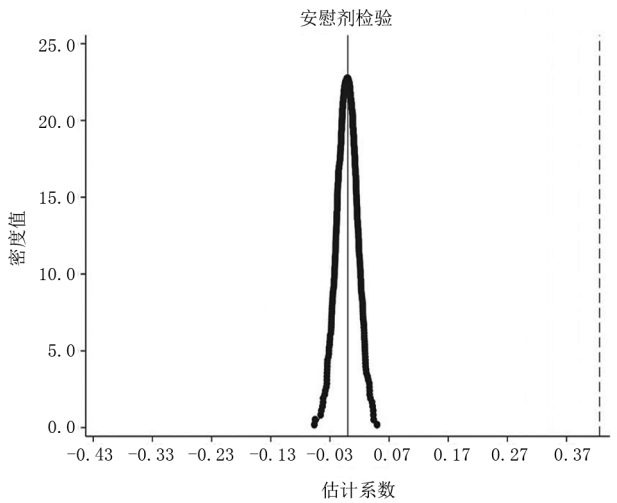


图 2 稳健性检验(安慰剂检验)

五、异质性分析与机制研究

(一)异质性分析

为探究留抵退税政策对不同类型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本文采用分组回归以及加入交互项(自变量与分组变量的交互)的方式进行研究。在企业产权异质性分析中,本文将企业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从表 6 列(1)~列(3)的回归结果来看, $treat \times post$  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与因变量呈正相关关系,故不存在显著性方面差异,为进一步研究系数大小差异,引入  $treat \times post$  与产权性质交乘项再次回归,交乘项在 10% 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留抵退税政策对国有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效果更强。在企业规模异质性分析中,本文将企业分为大规模企业和中小规模企业,从表 6 列(4)~列(6)的回归结果来看,大型企业和非大型企业的  $treat \times post$  系数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不同规模企业,留抵退税政策都能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模型中引入  $treat \times post$  与企业

规模交乘项再次回归,交乘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留抵退税政策对非大型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效果更强。在行业性质的异质性分析中,本文将企业分为高科技企业与非高科技企业,从表 6 列(7)~列(9)的回归结果来看,高科技企业与非高科技企业的  $treat \times post$  系数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不同行业企业,留抵退税政策都能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引入  $treat \times post$  与行业性质交乘项再次回归,交乘项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留抵退税政策对高科技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效果更强。

(二)机制研究

为研究自变量通过何种路径影响因变量,同时避免传统三步法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江艇(2022)两步法<sup>[26]</sup>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第一步为  $treat \times post$  与  $Npro$  的回归,即前文基准回归,结果显著通过;第二步,将因变量分别换为机制变量交易成本  $Cost$ 、融资约束  $FC$ 、研发创新产出  $RIO$  进行机制效应回归检验。根据表 7 第(1)列可以看出:留抵退税政策对交易成本影响的估计系数为-0.0224,且在 1% 水平下显著,表明留抵退税政策会显著降低交易成本进而促进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根据表 7 第(2)列的回归结果,核心解释变量  $treat \times post$  依然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与融资约束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表明留抵退税政策会显著降低融资约束进而促进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根据表 7 第(3)列可以看出,留抵退税政策对研发创新产出前的估计系数为 0.1945,且在 1% 水平下显著,表明留抵退税政策会提高企业研发创新产出进而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提升。

六、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 2011~2022 年的数据,实证研究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此效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留抵退税政策能够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交易成本和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效率,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内部发展预期,营造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进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第三,对于不同属性、规模的企业而言,留抵退税政策对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国有企业、高科技型企业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效果更加显著。

表 6 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产权性质			企业规模			行业性质		
	(1) 国企	(2) 非国企	(3) 组间 系数差异	(4) 大规模	(5) 中小规模	(6) 组间 系数差异	(7) 高科技 企业	(8) 非高科技 企业	(9) 组间 系数差异
$treat \times post$	0.5737 *** (11.54)	0.3480 *** (9.72)	0.3717 *** (11.70)	0.4157 *** (10.95)	0.3941 *** (8.89)	0.6305 *** (9.13)	0.2445 *** (6.45)	0.1476 *** (2.89)	0.2330 *** (4.55)
交乘项	—	—	0.1495 * (3.32)	—	—	−0.1347 *** (−3.20)	—	—	0.2696 *** (5.00)
Size	0.4016 *** (7.86)	0.2373 *** (7.95)	0.2913 *** (11.63)	0.2716 *** (8.04)	0.3604 *** (9.24)	0.2981 *** (11.78)	0.2755 *** (8.48)	0.1890 *** (5.36)	0.2978 *** (11.90)
Lev	−0.8628 *** (−4.54)	−0.1175 (−1.06)	−0.3685 *** (−3.96)	−0.2934 ** (−2.11)	−0.5273 *** (−4.13)	−0.3970 *** (−4.28)	−0.2408 ** (−2.06)	−0.5427 *** (−3.73)	−0.3654 *** (−3.98)
ROA	−0.7291 * (−1.94)	−1.3375 *** (−7.00)	−1.3295 *** (−7.87)	−1.3376 *** (−4.70)	−1.2012 *** (−5.67)	−1.2907 *** (−7.64)	−1.2150 *** (−5.81)	−0.9948 *** (−3.81)	−1.2875 *** (−7.67)
ATO	0.3554 *** (4.74)	0.2803 *** (4.64)	0.3363 *** (7.38)	0.3355 *** (5.37)	0.2818 *** (4.15)	0.3291 *** (7.21)	0.2158 *** (3.07)	0.5064 *** (8.43)	0.3457 *** (7.56)
Cash flow	0.4003 * (1.68)	−0.0551 (−0.34)	0.1444 (1.06)	0.2718 (1.45)	0.0934 (0.47)	0.1449 (1.07)	0.0260 (0.14)	0.0624 (0.34)	0.1425 (1.05)
FIXED	8.0492 *** (29.60)	8.5997 *** (57.18)	8.3710 *** (60.14)	7.7195 *** (37.55)	9.1076 *** (49.12)	8.3735 *** (59.72)	8.4507 *** (50.37)	8.7368 *** (41.85)	8.3297 *** (60.02)
Growth	0.0373 (0.84)	0.0125 (0.44)	0.0256 (1.06)	0.0109 (0.35)	0.0349 (0.94)	0.0257 (1.06)	−0.0368 (−1.16)	0.0762 ** (2.20)	0.0192 (0.79)
Top1	0.6612 ** (2.47)	−1.0422 *** (−5.11)	−0.3523 ** (−2.24)	−0.2185 (−1.15)	−0.4147 (−1.57)	−0.3136 ** (−2.00)	0.0651 (0.33)	−0.1389 (−0.58)	−0.2589 * (−1.66)
FirmAge	1.5615 *** (6.36)	0.7133 *** (4.13)	1.0280 *** (7.48)	0.6876 *** (4.29)	1.2275 *** (5.22)	0.9656 *** (7.10)	0.7825 *** (4.34)	0.9509 *** (4.69)	0.9627 *** (7.10)
常数项	−10.673 *** (−8.01)	−3.7208 *** (−4.91)	−6.1161 *** (−9.59)	−5.0196 *** (−5.81)	−7.7526 *** (−7.89)	−6.0730 *** (−9.49)	−4.6719 *** (−5.70)	−4.3676 *** (−4.55)	−6.4274 *** (−9.90)
企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11420	22251	33728	17014	16714	33728	19861	13808	33728
R <sup>2</sup>	0.843	0.853	0.843	0.849	0.838	0.843	0.861	0.856	0.843

表 7 机制检验(融资约束、交易成本与研发创新产出)

变量	(1) <i>cost</i>	(2) <i>SA</i>	(3) <i>patent</i>
$treat \times post$	−0.0224 *** (−14.11)	−0.0117 *** (−7.90)	0.1945 *** (4.10)
Size	−0.0269 *** (−17.75)	−0.0016 (−0.80)	0.4057 *** (15.42)
Lev	−0.0120 ** (−1.98)	−0.0397 *** (−7.21)	−0.5195 *** (−6.50)
ROA	−0.2270 *** (−17.48)	0.0085 (0.96)	0.0431 (0.37)
ATO	−0.0832 *** (−31.43)	−0.0023 (−0.66)	−0.0267 (−0.50)
Cash flow	−0.0154 * (−1.78)	−0.0011 (−0.16)	−0.2562 (−1.54)
FIXED	−0.0121 * (−1.71)	0.0334 *** (4.91)	0.0730 (0.90)
Growth	−0.0177 *** (−10.84)	−0.0057 *** (−4.22)	−0.0197 (−1.05)
Top1	−0.0104 (−1.31)	0.0649 *** (7.60)	0.0192 (0.15)
FirmAge	−0.0393 *** (−5.92)	−0.0413 *** (−4.93)	1.0815 *** (3.45)
常数项	0.9577 *** (25.26)	−3.6796 *** (−83.05)	−11.2872 *** (−12.18)
企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33728	33728	33728
R <sup>2</sup>	0.821	0.964	0.740



新一轮税制改革应有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之义。因此,论文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进一步深化增值税留抵退税改革。根据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企业的实际需求,动态调整退税比例、额度及适用范围,确保政策能够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持续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推动新质生产力的不断涌现。如拓宽政策适用范围至 M 级新增企业,简并税率降低制度性留抵税额<sup>[27]</sup>。

第二,加强政策协同与配套措施。结合金融政策,如实施贷款贴息、降低融资门槛,以缓解企业融资难、降低交易成本,保障创新资金充足;同时,将留抵退税与产业政策紧密结合,引导企业向新兴产业、高科技领域增加投资,加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及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此外,还应完善创新支持体系,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健全创新激励机制,激励企业加大研发力度,有效提升创新产出效率。

第三,实施差异化政策,精准支持特定企业群体。针对不同属性、规模的企业在留抵退税政策中表现出的不同效果,建议政府实施差异化支持政策。对于国有企业和高科技型企业等具有明显创新优势的企业,可以给予更加优惠的退税政策或提供更多的创新支持资源;对于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等处于发展初期、面临较大融资压力的企业,则可以通过提高退税比例、简化退税流程或提供专项融资支持等方式降低其融资成本、缓解融资约束。

参考文献:

[1]李政,崔慧永.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的新质生产力:内涵、形成条件与有效路径[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  
[2]刘伟.科学认识与切实发展新质生产力[J].经济研究,2024(3).  
[3]付敏杰,李绪恒.新质生产力的政策脉络、政策逻辑和政策重点[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  
[4]肖文林,高榜.政府支持、研发管理与技术创新效率——基于中国工业行业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14(4).  
[5]Kenneth J. A.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62(29).  
[6]张伦伦,蔡依娜.促进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增值税优惠政策设计[J].税务研究,2018(10).

[7]刘明慧,李秋.财税政策何以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J].上海经济研究,2024(3).  
[8]陶然,柳华平,周可芝.税收助力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思考[J].税务研究,2023(12).  
[9]宁殿霞,王寅.自然力理论视域下的新质生产力:理论渊源、历史契机与实践路径[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4(4).  
[10]蒲清平,向往.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内在逻辑和实现途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  
[11](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厉以平,蔡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12](英)A. C.庇古.福利经济学[M].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13]蔡伟贤,沈小源,李炳财,等.增值税留抵退税支持的创新激励效应[J].财政研究,2022(5).  
[14]刘长庚,谷阳,张磊.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就业促进效应[J].财政研究,2022(9).  
[15]刘金科,邓明欢,肖靖阳.增值税留抵退税与企业投资:兼谈完善现代增值税制度[J].税务研究,2020(9).  
[16]Edgerton J. Investment, accounting, and the salience of the corporate income tax[R]. NBER Working Paper, 2012.  
[17]张同斌,刘文龙.留抵退税改革、融资约束与企业产业链关联[J].管理世界,2024(3).  
[18]Coase R. H. The nature of the firm[J]. Economic, 1937(16).  
[19]吴怡俐,吕长江,倪晨凯.增值税的税收中性、企业投资和企业价值:基于“留抵退税”改革的研究[J].管理世界,2021(8).  
[20]何杨,邓栖元,朱云轩.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财政研究,2019(5).  
[21]郑家兴.财税政策支持我国制造业创新效应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21.  
[22]郭月梅,曹宁宁.增值税留抵退税改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3(11).  
[23]宋佳,张金昌,潘艺.ESG 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影响的研究——来自中国 A 股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J].当代经济管理,2024(3).  
[24]薛宇佳.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企业投资效率提升效应研究[J].财会通讯,2023(24).  
[25]张健,吴非,任玎.新三板企业 R&D 投资、融资行为与运营绩效[J].金融季刊,2018(3).  
[26]江艇.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中国工业经济,2022(5).  
[27]刘啟仁,赵灿,黄建忠.税收优惠、供给侧改革与企业投资[J].管理世界,2019(1).

责任编辑 刘玉成 E-mail:770533213@qq.com